

一次面向未来的迁徙

在这份2001年12月20日的《羊城晚报》上，老罗一家报道的旁边，还有两则新闻引起记者注意：《广东今年GDP再报捷 首闯10000亿！》《中国代表移位正式座席 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出席世贸总理事会》。这两则新闻勾勒出了他们一家搬迁至东莞时的时代大背景。那一年，中国刚加入WTO，还首次主办了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；改革开放蹄疾步稳的广东，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。

当时，阿菊的父亲罗德基在香港有份不错的财务工作，生活安稳。当他决意带着整个家庭——妻子美沙和五个4到10岁的孩子——迁往“一河之隔”的广东，身边的同事、朋友无一

理解。

“我觉得中国内地正走上坡路。在内地，机会更多。”那时，老罗常因工作去上海出差，亲眼看着满街的自行车在几年间换成了川流不息的汽车，“变化快得让人兴奋，我想成为这一变化的一部分”。

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，是对孩子成长的期望。老罗尽管在美国长大，但因德国家庭背景，许多生活习惯仍是德式的。他不想孩子们和他一样，而是真正成为跨文化的“中国通”，真正融入中国人的“圈子”。妻子美沙相信丈夫的判断：“我们第一次来东莞就爱上了这里。”美沙说。

于是，他们在东莞一个新建的小区买了房，街对面就有一所不错的小学。2001年，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背着书包，走进了全是黑头发同学的教学楼（另外两个孩子上幼儿园）。这个画面被记者捕捉下来，登在了报纸上。

这篇24年前的报道，记录了老罗夫妇

当时的想法：“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五个孩子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，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，最终成为‘中国通’。我们的孩子将是中西方教育的完美结合。”

这篇报道述不尽的，是这个选择背后需要多少勇气与坚持。

一份跨越经验的守望

这份坚持的重量，美沙体会最深。家长会，是她的“难关”。最初，班主任的话她一句听不懂，只能靠身边的孩子压低声音、零星地翻译几句要点。听着周围陌生的语言，看着黑板上不解的文字，她感到一阵巨大的挫败感，甚至曾悄悄抹过眼泪。

更大的挑战在于，她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当“妈妈”。中美文化不同，教育方式相异。“我不能总是跳起来说‘我们美国不是这样的’”。从最初的困惑，到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适应甚至如鱼得水，她的想法慢慢发生了转变。

改变的不只是观念，还有生活里细小的习惯。孩子们放学回来想吃“排骨”，她兴致勃勃地做了美式肋排，孩子们却摇头，说想吃的是中式排骨。那一刻的“错位”，让她明白，孩子们正在一个她不完全了解的世界里成长。

老罗管这叫“放手”。阿菊的比喻更形象：“我爸妈做的决定，就像把五个小孩直接扔进了中国的‘海洋’里。他们只在岸边看着，最多扔个救生圈下来，我们自己扑腾着学会游泳。”

阿菊直到长大后才真正明白，父母那份看似淡定的“放手”，背后有着怎样的牵挂。“他们其实一直提着心，只是后来看到我们‘游’得还不错，担心才慢慢放下，也才真正看懂，我们接受的这套教育，原来扎实有用。”阿菊感慨，父母在孩子成长的岁月里，要放下自己的全部经验，去相信一个陌生的系统，并且十几二十年如一日。

地，不怀疑这个选择，绝非易事。

一种无需翻译的懂得

孩子们这堂成长的“游泳课”，始于入校第一天。“几乎所有楼层的人都趴到栏杆边看我们，”阿菊回忆，“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。”

冰，逐渐被同学们的好奇和善意融化。学校食堂里，总有人大着胆子过来问：“我能和你们一起坐吗？”友谊，就从饭桌上的聊天开始了。

20多年过去，阿菊还记得好朋友家的座机号码。她们一起挤过公交车，一起把每周50元零花钱合起来，计划怎么花。朋友的父母，成了她在中国的“干爸”“干妈”。“我在国外的亲戚，反而像陌生人；但这里的‘家里人’，是陪我长大的。”阿菊用粤语说道。

对美沙来说，所有磨合的酸涩，在一个最普通的清晨被彻底化解。那天，她去学校，看到孩子们在操场和全校数百人一起做课间操。

“我一下子哭了，”美沙说着，眼眶又有点红，“我看着他们，动作那么自然，和身边每一个同学都一样。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完全融进去了。”

“融进去”——这个词她用得精准。那不是简单的“模仿”，而是几个孩子的呼吸、节拍乃至心神都与中国孩子们融为一体。那一刻，广播操的旋律俨然成了无需翻译的通用语。

一场历时24载的扎根

20多年，足以让一株幼苗扎根，成长为参天大树。

老罗夫妇当年的选择与坚持有了回报：五个孩子，两个上了厦门大学，三个读了中山大学。如今，除老大罗云妮在新加坡工作外，其他四个孩子都留在中国发展。老二罗曼莉在深圳的一家幼儿园做英文教师。老四罗杰信从事

餐饮行业，曾受聘赴克罗地亚打理一家餐厅，但因更喜欢在华生活，回到东莞开了一家酒吧。老三罗惠莉和最小的阿菊则都做起了自媒体博主。阿菊在B站、微信视频号、小红书等平台开设了“阿菊Addy”账号，分享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“老外”的日常，全网粉丝量接近100万。

除此之外，五个孩子也是父亲生意上最好的“翻译”和参谋。美沙也终于卸下了照料家庭的重担，和几位中国牌友成了“麻将搭子”。

那份让人第一次“出名”的《羊城晚报》，被老罗一家珍藏着。“这份报纸对我们家来说像一份证明，证明我爸妈当年所作决定是正确的。”阿菊说。

今年9月，阿菊和姐姐罗惠莉一起回了趟美国，姐妹俩拍了一条《勇闯纽约》短片。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热闹非凡：“两个老广勇闯纽约！”“你们表里不一，外表美国人，内里纯中国人！”诸如此类的调侃比比皆是，阿菊看得津津有味。这些玩笑，恰是对她身份认同最温柔的认证。

日常生活中，当被问到是哪里人时，阿菊的回答没有犹豫：“我爸德国人，我妈美国人，但我在中国长大。这里就是我的根。”

从2001年到2025年，世界变了，中国变了，广东变了，罗家也变了。当年那个“反常”的选择，在今天看来却像一则精准的预言。他们不仅完整见证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也见证了广东从“世界工厂”到创新高地的蜕变、全省GDP从1万亿元到14万亿元的跃升。他们用亲身经历证明，最成功的“中国通”，不仅会说流利的中文，更能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把根扎下去，让生命长出独特的形状。

20多年，扎根中国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。对老罗一家而言，个中秘诀藏在阿菊流利地道的普通话和粤语中，藏在美沙熟练的洗牌声里，也藏在老罗坚定的选择中。

教育焦虑弥漫之下，罗家的故事是一面镜子

记者手记

这是一份承载着时光重量的报纸。纸页微黄，平整得没有一条多余折痕。当阿菊小心翼翼展开这份珍藏了24年的《羊城晚报》时，作为当年报道者之一的我，心潮翻涌。

2001年，我24岁，刚褪去学生气，懵懵懂懂跟着前辈去采访，笔下还是青涩印记。岁月流转，当年照片里古灵精怪的小丫头阿菊，如今竟与我当年的年纪相仿。再相逢，她落落大方地站在我面前，眉眼间既有西方式的明朗，又透着东方人的温润。那一刻，时光仿佛折叠，有种亦真亦幻的穿越感。

这些年，媒体格局天翻地覆，许多同行转身离场，但总有一些时刻，让我庆幸自己还坚守在这个职业里——那些走进人心深处、记录家庭悲欢、见证时代如何改写普通人生运的瞬间，是这份职业永不褪色的魅力。

阿菊轻车熟路地领着我们走进她住了近20年的家园，看到熟悉的窗口便热切地介绍起来：“那是我干妈家，那是我闺蜜家。”这个东莞小区早已是她生命的一部分。和不少中国父母一样，如今，

老罗和美沙也不可避免地成了“空巢老人”。但他们的日子并不空落——收养流浪猫狗、收藏中国手表、与街坊一起打麻将、参加当地的辣椒酱制作比赛……这对夫妇用20余年时间，把自己活成了地道的东莞居民。

聊起孩子们的成长，这对夫妇的教育哲学，在当下这个普遍“内卷”、分数至上的语境里，如同一股清流，澄明而坚定。他们希望孩子成为“中国通”，不只是听说读写，更能理解中国文化的肌理与温度。他们欣赏中国式教育为孩子们打下的坚实根基，也跳出应试教育的框框——不强调标准答案，更在意独立思考；不盯着分数，而是守护好奇心；不在意大学排名，更珍视大学作为孩子第一次真正独立、为自己负责的起点……

谈及孩子们的现状，普拉提老师、酒吧主人、幼儿园教师、自媒体达人……这些或许并非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标配”，但美沙语言里满是欣赏与骄傲。因为她看到的，是每个孩子都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成色：有热爱，有方向，有根有源，有底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

致读者诸君

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系统性变革全面启动之际，羊城晚报常态化开展“寻找当年的你”活动，征集读者用户与羊城晚报的情缘故事线索。您可以通过羊城派客户端“记者帮”报料，或私信羊城晚报微博号、羊城晚报公众号提供宝贵线索、讲述动人故事。



阿菊拿着父母珍藏了24年的《羊城晚报》。刊于2001年12月20日的这份报纸，头版头条为《在东莞的一对美国夫妇有个心愿：让孩子接受中国教育成为“中国通”五个洋娃娃齐返大陆读书》。

24年过去，五个洋娃娃真的成了“中国通”

羊城晚报曾报道的这个西方家庭，以预见和坚持写下“扎根中国”指南

2025年12月4日 / 星期四

责编 陆德洁 / 美编 李金宝 / 校对 刘媛元

专题 | A3

南粤最美职工郑秋桦：

从一株兰花种苗到千万富民产业

南粤最美职工

总策划/温文星 任天阳 林海利
策划/袁子雅 林洁
统筹/姚文军 董柳
执行统筹/刘雪晴 侯梦菲
文/图 柳卓楠



郑秋桦(左三)
在兰花基地指导
学生 受访者供图

兰“植物工厂”实验教学工作站。

“传统兰花种植太难了，病毒感染率超90%，成品率不足70%，高端种苗30%靠进口。这些都是蝴蝶兰本土化、产业化发展的难题。”为此，郑秋桦带领学生潜心钻研，对准产业痛点进行科技攻关。

针对“病毒苗多”问题，他们研发的“蝴蝶兰脱毒苗培养法”，使脱毒率达到100%；针对“幼苗烂根”难题，他们自主研发的透气培养盆，将幼苗成活率从70%提升至95%；针对蝴蝶兰“催花慢、卖期短”问题，他们研发了“四位一体控花技术”，使催花期从40天缩短到20天，并让销售期延长了2-3个月。

20多年来，郑秋桦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蝴蝶兰产业痛点，掌握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，还培育出35个新品种，获授权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8项。

“如果不掌握技术，只是拿别人的种苗来养殖、销售，这对产业化发展是很不利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自主研发，这样才能实现源头自主可控。搞科研，一定要自主掌握知识产权，不能受制于人。”郑秋桦说。

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

“这个玻璃罐子里有100多株兰花幼苗。培育长大后，一株兰花的批发价是20多元。你手上这一瓶就值2000多元……”走进韶关学院生物与农学院实验室，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透明玻璃罐，罐中乌黑色的养液上生长着一簇簇绿色的兰花幼苗，如同一个个微型的植物世界。

这是郑秋桦的“兰花乐园”。看似普通的瓶瓶罐罐背后，藏着价值千万元的富民产业，更浓缩了他过去20余载育兰之路。

郑秋桦大学毕业后，曾在北京一家台湾兰花企业实习。“当时韶关还没有兰花产业，我在实习期间发现兰花产业有很大的经济前景。回来之后，我就打算做这个研究。”在韶关学院，郑秋桦组建了全国高校唯一一个专注蝴蝶兰产业研究和转化的团队，并建立了蝴蝶

科研成果赋能乡村振兴

“有了好技术，怎么让它扎根乡村？”在兰花科研之外，郑秋桦也十分注重兰花产业化发展，尤其是用科研成果赋能乡村振兴。“我要坚持下去，让更多乡村富起来，让更多农民富起来。”他说。

走进韶关南雄市珠玑镇梅关村，村墙上绘制了兰花和诗词，村中随处可见兰花的身影。韶兰(南雄)种苗培